

# 论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王运涛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郑州, 450013)

**摘要:** 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鲜活载体, 阅读古典文学是百姓求知增慧、休闲娱乐最经典的生活方式, 古典文学传播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的迫切需要。从文化发生学的层面看,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与中华民族发展有着深刻的渊源。本文试从古典文学传播取向上挖掘文学传播中深层的价值问题, 尝试归纳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 古典文学; 民族发展; 文学传播

## 一、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现状概述

眼下, 古典文学传播研究日益接近“显学”, 俨然已经是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顾名思义, 古典文学传播学者, 研究古典文学传播之专门学问也, 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沈阳师范大学的曹萌教授将之精要地概括为古典文学的传播和传播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传播学”是一个年轻而新鲜的词语。自传播学传入中国, 1978年复旦大学新文学刊物《新闻大学》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 至今也仅20年的光景。但最早的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至今, 我们尚能每每从《修辞学》或《论语》中找寻到对传播现象研究的精辟论断。直接将传播学原理运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是目前一个新兴的领域, 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从2006年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文言先生的《文学传播学引论》出版, 2007年新学期伊始沈阳师范大学曹萌教授连续两年为其研究生开讲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课程,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推出了《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第二辑, 让我们终于看到了文学传播研究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习惯, 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传统, 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 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 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1]古典文学传播学便是在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门专学, 是实至而名归, 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它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 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也是势在必行的。

在古典文学传播的漫长历程中, 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尤其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 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 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公元前的孔子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魏文帝曹丕, 极重视文章的写作, 认为文章可以“经国”, 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王充也说过:“为世用者, 百篇无害; 不为世用者, 一章无补。”唐代的大诗人杜甫, 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 再使

风俗淳。”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2]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使得古典文学的传播对民族的发展也深含文化意义。古典文学传播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理论体系，重在探讨古典文学传播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古典文学的民族语言风格，特别是其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含蓄、简约、凝练、节制，及其所蕴藏的表达的可能性都构成了作品充满民族性的哲性诗学内涵和艺术形式。本文试从古典文学传播的选择取向上挖掘文学传播中深层的价值问题，尝试归纳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 二、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鲜活载体，阅读古典文学是百姓求知增慧、休闲娱乐最经典的生活方式，古典文学传播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的迫切需要。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传播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中华民族的自觉。

(一)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政治倾向为民族发展集思广益，使民族精英进退裕回。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古典文学传播和民族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功莫大焉”的作用，也是文学传播和民族发展相生互动的人才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不约而同的集体追求。中国古典文学家的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其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其心理定势。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3]中华民族崇尚文学、善于修史的热情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治国兴邦的基本理念。历览前贤家与国，情文并茂的策论、政论、讽谏书对统治者所起到的作用，宏观来看，绝不容小觑。如贾谊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过秦论》总结了秦代兴亡的教训，实则昭汉之过。《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4]“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令人颇为遗憾的是，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不拔到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情怀；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无悔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襟抱，“士”文化人格“兼济天下”的理想从来就没走上坦途，等待他们的更多的是穷愁失意或贬谪、污辱，甚至是拘捕、囚禁、流放和杀戮。[5]但自古文章憎命达，贬官士人群体的出现对古典文学传播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确是起到了助推作用的。苏轼流放海南，柳宗元贬谪永州等，均可为明证。

(二)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补史倾向为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殷鉴。“纪实与虚构”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众所周知，中国人是重视反思历史的民族，古典文学中不乏缅怀历史，追慕前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

总结历史经验的佳篇巨制，它们是联接历史与现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崇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中国古代士人们，面对民族发展遭遇到的种种劫难，在古典文学中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这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语）如《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水浒》也确实曾被后世起义者从军事上学习，从组织形式、绰号等方面加以效仿，甚至近代 20 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也是从《水浒传》得到启发的。“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统治者从历史中汲取治世之道提供了可能性。

（三）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地志书写为民族发展增强了亲和力和向心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的文化，成就了一方的文学。“地志书写”乃是一种地方书写，亦即透过特定地方或景观的描绘，牵引读者去认识或建构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特色，常带有土地认同的情感意义。一种文学艺术的兴起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地理季候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往往给当地文学艺术镌铭地方个性，并对其发生和传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已经被许多鲜活的个例所证实。作家与空间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怀，它不只呈显在个别作家的作品里，也流露于文学集团具有地域视野的创作当中。吴江派、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大家、浙派词、常州词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竟陵八友、吴中四士、岭南七子、江西诗派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个地方的士人群体，撑起一个文学流派，传播一方地域风情，弘扬一种地方文化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一个地方的文学实际上记载了一部立体、感性的区域性文化史，其蕴涵的对于天候地收的感遇和劳动过程的体验，多能深刻地展示民间百姓生活和心灵的历史。谁不说俺家乡好，好就在地杰人灵，而地志书写则再现了浓浓的乡音、熟稔的景物、大好的河山、共同的苦难等等，读者一旦遭逢地景地貌的书写，便因其催化作用而更容易领略作者的情感，有利于勾起人们对同一片热土的挚爱，对同一个家国的热爱对同一个民族的认同。地志书写的实质是在强调一种地缘的情结，其影响力是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的。君不见“四面楚歌”唱垮了楚霸王强悍队伍的斗志，“窗前明月光”勾起了游子无尽的思乡之情……这种地志书写、地域传播也是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的生动体现之一。

（四）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哲理倾向为民族发展、祖国统一奠定了理论根基。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其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也密切相关。譬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有着历史渊源。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

功绩。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其时，学术百家强调“夏夷之辨”，莫不自思以易天下。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观念发展。“天下大一统”观念体现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崛起的秦国顺应了这一趋势和方向，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史上，高举渴慕祖国统一旗帜，标榜献身民族发展旨趣，痛感国将不国的文章，始终是高亢动人、响彻云霄的主旋律之一。君不见，每每遭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动荡，便爱国诗人代不乏人，爱国诗派源远流长，不断谱写“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华章，于是乎，文学传播与民族发展携手同行时则“临行密密缝”，民族发展与文学传播悖行时则“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民族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根基深厚的五大哲学基石：即“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爱国主义的人生观；“义利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天下为公的伦理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这五大哲学基石在古典文学中都有着充分的表现，随着古典文学的传播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生命力具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五)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教育倾向对民族的和谐发展承载了宣传导向职能。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古典文学的价值存在于其自身的广泛传播和人们的理解之中，其存在也因其广泛传播和受众的种种理解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存在。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读《出师表》而知忠，读《陈情表》而知孝，中国数千年的统治则一向以“臣忠子孝”治天下，于是中国古典文学便隐隐具有凝聚人心、教化众生之功效。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诫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古人说，士以器识为先。同理，士的文学，亦先须有器识上的大气。生命格局大，表现为有志气，有自信，有天下担当。生命风调美，也表现为有才华，有魅力，足以使人向往追随。岳飞的一首《满江红》，李贺的一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唤起了无数热血男儿的报国志；林则徐的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又激起了多少中华儿女投身到民族发展的洪流中，舍小家为大家。浸染了儒家思想的文人士子，在古典文学中传播的儒家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品格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导作用。

(六)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抒情倾向为民族发展发挥了激起共鸣、沟通人心的凝聚作用。中国文学传播过程中，历来奉行“有真情感自是好文章”的传播取向。盖因中国文化的深处，也正是人性的感动，是人心与人心的照面。中国文化最看重心灵相通，精神相感，对于诗文的评价，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就是

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一部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国人的民族认同史，其中情感上的认同是最有力量的认同，是稳定的民族心理形成的坚实基础。梁启超一篇《中国少年说》道出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声：“美哉，我中国少年；壮哉，我少年中国”！这种摧枯拉朽的情感力量与古典文学丰厚的审美意蕴、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一起发挥作用，对于交流情感、激起共鸣、沟通人心、众志成城、振奋精神、保家卫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七)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的道德倾向为民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突出的表现为人们对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关注。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是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因此，古典文学传播中倾向于选择那些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的作品。从先秦诸子以降，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关怀最终都是指向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建立以及新的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这是士人文化精神共同的价值取向。汉代的司马迁在先秦时代的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此外，古典文学传播中日趋明晰的创作方法论的一脉相承也对民族发展起到了凸现集体记忆、情系家国民族的积极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创作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文学发展本身构成了民族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6]历代的士子文人总是先自觉地将让自己肩负起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明传承的使命，然后才能更大程度地挖掘自身潜力投身民族发展的大业中去的。因此，文学创作与传播的过程也便是为民族发展训练人才、积蓄力量的过程。

### 三、古典文学传播对民族发展的现代启示

古典文学传播要注意对民族情感的尊重和民族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接受。中国优秀的文学家历来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古典文学传播似有一个明显的民族化过程，表现为在传播中往往会附着、增益某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诸如深沉的血缘之情，热切的乡关之恋，深重的家国之虑，浓厚的历史感，深邃的

哲理之思等等。古典文学传播中民族情感因素、民族伦理道德和民族风俗的作用,说明古典文学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特有的一种民族情结。因此,当古典文学担当起宏大历史叙述的重任时,其传播往往会有更深远的影响。这就启示我们,民族文化是古典文学传播的灵魂,古典文学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字共同体”,借助丰富的文学传播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例如,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亚洲等华人圈中短时间内大受欢迎的盛况与其在欧美的渐次升温,背后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关。古典文学在传播中走向经典化的过程,迈出了中国文学民族化坚实的一步;眼下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实现传播突破,就要考虑将民族情感、道德、以及风俗的因素加以运用,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古典文学传播取向中高扬的经世致用思想、道德风范意识等,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良风美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也到处可以看到古典文学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从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轨迹来看,首先是那些艺术上民族特色鲜明、内容上与民族发展大势暗合的优秀作品最具传播生命力。古典文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古典文学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文化的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依归,古典文学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必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弘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中华文化的崇尚统一、追求和谐、注重道德、张扬自强高尚人格、讲求厚德载物气度、主张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等优秀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精神结晶,更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要维护民族团结、民族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一种强大无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能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依据,自信心的根源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确认识。通过经典文学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认识了中国文化,认识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发展、文化交融、碰撞以及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从这一宏观视角来看,古典文学传播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当下意义决不容轻视。

####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 张少康 《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
- [4] 曹萌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M]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01, 6
- [5] 宋先梅 《〈三国演义〉与士人文化心态》[J]《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 [6] 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1

作者简介:王运涛(1977-),男,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传播研究。